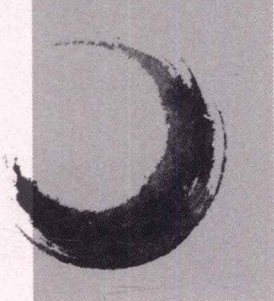


周颖菁
著



近三十年 中国大陆背景 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 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

周颖菁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周颖菁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307-08152-9

I. 近… II. 周… III. 女作家—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0922 号

责任编辑: 吕鹏娟

责任校对: 黄添生

版式设计: 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6.75 字数: 237 千字

版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8152-9/I · 411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我不知道外国人用文字介绍中国的情况，或在外国的人，用文字介绍中国的情况，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以我读史书的一点浅薄的经验，如果把汉通西域以后，匈奴的使节、探子向他们的国王（单于）、将军汇报汉地的情况，或被掳掠、羁留、投降匈奴的汉人，在异域以各种方式言说中原的文字，都算在内的话，那自然是很早的了。虽然这些可能有的或实际有过的文字，今天能够见到的，少而又少，而且又都不是或不都是可以被称作文学的东西，但算作这一问题的肇始，~~应该是没有问题~~。汉以后很长时间在与异域交往的过程中留下的有关中国的类似文字记载，大体也属这种性质。这里面自然也包括中国人对异邦的记述。虽然古代中国的概念与今天不同，古代中国境内的国家关系也十分复杂，但从张骞以后的几代汉臣，到向西域取经的唐僧玄奘，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人们之间相互观照（包括感受、理解和认识），即“互看”的方式，却有许多共同之处。因而他们所留下的记述异域的文字，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虽然不全是“外国”或全属“外国”，但也总算是生活在中原内地的汉人看“外人”的一个开始。

现在大家关注较多的，是明清两代西方的传教士、探险家、殖民者留下的有关中国的文字记载。这些也不都是文学或都不是文学，但却与文学关系紧密，对创作文学和研究文学的人来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同样，从这个时候开始，那些最早与西方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也在有意无意地用语言文字记述他们间接得知的或由此想象、推测的西方模样。当然，这时候的西方，已不是汉唐的西域，而是有着确定所指的欧美列强。到了晚清，有关西方的文字记述，不论是文学的还是非文学的，较之以往，都增加了更

多亲历的或经验的成分。西人对中国的记述，亦如是。这时候，最突出的问题不是相互之间对具体事物的知见和了解，而是互相看对方的观念问题。西方既处于强势，则看中国处处皆贫，事事皆弱，笔下就免不了有许多丑化、恶化中国的描写。相反，中国因处于劣势，觉得积贫积弱，事事皆不如人，笔下也就免不了要对西方加以美化、神化。这种观念的反差，甚至到晚近三十年，依然存在，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说到观念问题，自然十分复杂。它的形成和改变，都非一日之功，更不是单靠学习、交往、游历就能解决的。从古代的夷夏之别，到近现代的强弱异势，其间观念的差异和对立，今人的结论虽渐趋一致，但如论当代，可能依旧聚讼纷纭，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楚的。记得20世纪80年代，有机会第一次读到从台湾去美国的一些作家，如聂华苓、白先勇、於梨华等人的作品，觉得他们笔下的人物寄人篱下，漂浮无根，很是可怜。论者说他们是“无根的一代”，他们自己也颇多“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叹。在这种境遇下看西方，自然依旧摆脱不了近代以来形成的强弱异势的眼光。故国在他们笔下，不过是寄托思念、发抒乡愁的对象。虽然在这思念和回忆中，也会有一些美化甚或神化的成分，但终究不敌他们对西方的依附和西方对他们的吸引力。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国门大开，也有许多人去了西方。其中就包括一些已有写作经历的作家，或后来成为作家的非职业的写作人。他们写中国，也写西方，或者说，他们的作品中有中国也有西方，写中国是记忆中的经历或回忆中的印象，写西方则是现实中的经验或感受。虽然因记忆或回忆、经验或感受的不同，而有差别，但与台湾的那一代作家相比，已无漂泊无根之感，却是一个事实。这样说，并不是说在他们的观念中，就已经改变了近代以来形成的中西方强弱异势的格局，而是说，这种强弱异势的格局，在他们的写作实践中，已变得十分复杂。当他们经历过如“文革”那样的历史劫难，或不满足于固有的生活，他们会以西方为强势的拯救者和理想的归宿，类似于周颖蓀所说的，把西方当作“救世主”。而当他们真正面对或置身于西方的强势之中，他们又感到这样的归宿并不理想，真正能

拯救他们的，依旧是他们心灵中的故土。这不是简单的思乡之情和爱国主义，而是在精神上的再度融入和亲近。因为已有了西方的经验，所以这种再度的融入和亲近，就带有诸多西方元素和西方人看问题的眼光。于是他们笔下的中国，也就有了周颖菁在书中所说的各式各样的“形象”。这种看似“分裂”的中国形象，不是被西方的强势肢解的结果，而是在异质文化的交互观照中的一种精神建构。这样的交互观照，显然已经改变了长期以来的强弱定势，而接近于一种被今人称作“跨文化”对话的平等意识。

从夷夏之别到强弱异势，进而到平等的跨文化对话，这是广义或狭义的中西方互看的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也是这一历史过程的必然走向和发展趋势。也许今天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所谓“全球化”，它的积极结果，最终会把我们带入一个世界各国和各民族人民平等互看的时代，但今天我们无疑仍处在这个过程之中。周颖菁的著作讲了这个过程中一个递进、转换阶段上的状况。那些出入于中西之间的“大陆背景”的女作家，不过是在这个阶段上游走的一些活性分子。她们的复杂经验和感受，包括某些矛盾和困惑，将为此递进、转换期的历史提供一份文学的证词。

这本著作的底子，是周颖菁的博士论文。成书后，问序于我，我是她的指导老师，不想说套话和溢美之词，只就我个人在指导论文过程中的感想和平时的读书心得，说了以上的话。用意虽不在表扬周颖菁，但结果仍不免让人感到，这是在为周颖菁的著作说好话。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也坦率地说明，读过周颖菁的这部著作，你或许相信，我以上的话，多少能够证明，她的这项研究，在这个领域，确有一种承前启后的意义和价值。

是为序。

於可训

2010年6月8日写于珞珈山两不厌楼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西方“他者”形象	18
第一节 历史中的“他者”形象	19
第二节 “越界”前“救世主”形象的产生及内涵	24
第三节 “越界”后的西方“他者”形象塑造	31
一、地图上的他者	34
二、跨文化交际会话中的他者	48
三、“视觉盲点”和“话语权威否定”中的他者： 以严歌苓作品为例	70
第二章 中国“自我”形象	79
第一节 古典中国形象	86
一、意象中的乡土中国	87
二、文化精神中的乡土中国——以家族为核心	99
第二节 悲剧中国形象	108
一、悲剧书写	109
二、超越苦难	125
第三节 民间中国形象	131
一、被戏仿的中国形象	133
二、狂欢的中国形象	139
三、被拼贴的中国形象	144
第四节 转型期中国形象：对“自我东方主义”的反省	147

第三章 东西之间与身份问题	160
第一节 边缘人形象与身份问题	163
一、自传性边缘人形象	164
二、非自传性边缘人形象	170
第二节 记忆与身份问题	178
一、记忆情结	179
二、家国记忆与个人记忆的融合	188
三、记忆与认同疑虑	191
第四章 跨文化写作中的女性问题	197
第一节 对女性主体性的发掘和补充	198
一、对中国女性传统精神的重新认识	198
二、对现代女性理性精神的发现	204
第二节 女性写作视域的拓展和深化	214
第五章 跨文化写作中的语言问题	225
第一节 故事中的语言问题	227
第二节 作家的汉语写作意识	233
第三节 作家的方言意识	240
结 语	245
参考文献	251
后 记	258

引 言

一首英国童谣这样唱：“德国人生活在德国，罗马人生活在罗马，土耳其人生活在土耳其；但英国人生活在自己家。”这首童谣反映出传统本质主义的身份认知方式：个人身份在国家疆界之内被建构。此种身份建构方式线条明晰，泾渭分明。童谣也蕴含这样的意义：在独立“国土”中，个人很容易找到自我的位置，找到社会归属感和文化归属感。童谣还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在疆界保护之下，个人有充分的安全感，“国”即是“家”，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个人在“民族”这一“宿命”的共同体中可获得可依赖感：“使人们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①

童谣表达了封闭却充满温情的古典主义情怀。但早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认为这种古典主义情怀即将逝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②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就一般意义而言，全球化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日常的生活体验”，“人们已经开始习

① 吴叡人：《认同的力量：〈想象的共同体〉导读》，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13页。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0页。

惯并依赖于这种生活了”。^① 历史发展到 20 世纪、21 世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跨国界迁徙出现了。资本、劳务、经济产品和文化产品在国与国之间流动，不同民族和国家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传统民族国家的疆界变得模糊，具有多重身份和多种文化背景的人不足为奇，人们无法再简单地说“德国人生活在德国，罗马人生活在罗马……”。

人类生活在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世界中，特别是近年来，信息、资本、市场的全球流通力量日益增强。全球经济经验、文化经验、日常经验的趋同性也越来越显著，新的世界图景逐渐形成。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在现代日常社会，个体处于外延性（extensionality）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y）两“极”之间不断增加的关联中，一极是全球化的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② 吉登斯说，“当代社会里个人则被定位于一系列丰富宽泛得多的层面上，包括家庭、工作场所、邻里、城市—国家（nation-state）以及一个世界性系统，所有这些都展现出某些系统整合的特征，将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与大规模时空延展的社会现象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③ 大卫·哈维在 1989 年提出“时空压缩”的概念，“他将马克思有关‘资本’的观念进一步加以发展，认为后现代的科技发展，已经大幅度改进了沟通和交流的科技，因此资本主义更能够通过全球化的途径，克服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让生产与消费迅速可及，而几乎没有时间障碍。”^④

“跨文化”是现代人类学和文化学中的一个概念，“关于跨文化的身份构成，人类学者大卫·托马斯《跨文化空间和跨文化生

① [英] 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译序第 5 页。

②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 1998 年版，导论。

③ [英]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63 页。

④ 廖炳惠：《关键词 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50 页。

存》一书，以外来的西方人与安达曼岛原住民的最初接触与互动为素材，提供了非常精辟的人类学论述。他提出‘跨文化生存’（transcultural beings，或‘跨文化的人’）的新概念，说明不同文化的碰撞如何改造和重塑着习惯性的感知方式，产生与单一文化生存不同的生存方式和表现方式”^①。

与“跨文化”相关的文学现象由来已久。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探讨了18世纪末流亡贵族和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之间的关系。而英国诗人拜伦、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英国诗人艾略特、美国犹太小说家索尔·贝娄、前苏联和俄罗斯小说家索尔仁尼琴等，都有跨文化背景。虽然他们创作的背景与当今全球化的背景大相径庭，但“越界”之后作家同样都面对“跨文化”的语境。因为有双重文化或多文化的影响，“流亡”作家看待人生、命运、人性、文学艺术的态度与单一文化背景下创作的作家相比，有其独特之处。“跨文化”无疑丰富了作家的人生经历，也丰富了作家的创作，使作家文学创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全球化时代大规模的“越界”给跨文化的文学书写带来了更大的契机。跨文化文学书写在文学创作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日益上升。20世纪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到了90年代后半叶，大部分则是流散作家”。^②“流散”与“跨文化”的关系不言而喻。“跨文化”成为许多作家的生存方式和精神体验方式，作家们以跨文化经历为资源的创作更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支流。萨义德认为，“在一切以民族划分的文化中，都有一种想握有主权、有影响、想统治他人的愿望”，“矛盾的是，我们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意识到历史与文化的经验是多么复杂地具有交叉性，它们怎样参与了许多时常是互相冲突的经验与领域，超越边界，与单一的观念和声势猛烈的爱国主义行为相对抗。文化远远不是单一的、统一的或自成一体

^① 叶舒宪：《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性知识”与“再阐释”》，见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② 王宁：《全球化：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

的。它们实际上含有的‘外来’成分、‘异物’和差别等等比它们有意识地排斥的要多。”^①

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的现代社会，坚持民族国家的单一性和“纯洁性”是站不住脚的，霍米·巴巴就说：“当然国际文化的基础并不是倡导文化多样性的崇洋求异思想，而是对文化的交杂性的刻写和表达。为此我们应该记住，正是一个‘际’字表达出谈判和转移的切割线，表达出一种‘居中的空间’，承载了文化意义的重负……”^②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打开了封闭的大门。开放使被禁锢已久的中国人建立了新的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参与到“全球化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普遍的状况”^③的历史进程中去，把自我认知、自我发展、自我命运纳入到世界格局之中。中国人不再只能生活在中国，终于成为“世界性民族的同代人”（普希金语）。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西方”是揭开面纱之后神秘的地域，更是现代化文明的代名词，也是改变命运可能的空间。以中国人去美国的人数为例，“自1978年选拔23名留学生始，到1997年中国已向美国派遣留学生163100人”，“其他各类人员，如作家、社会学者、科学家、演员、运动员的交往也增加起来”，^④时至今日，在海外的中国人更是难以计数。

本书所说的“西方”，是指以北美和西欧为代表的“西方”。北美和西欧有稳定成熟的文化精神和社会结构，在近三十年来，是中国人大规模跨越的边界，是世界“全球化”进程中“非领土性扩张化”最强势的力量，是影响当代中国最显在的异域空间。本

①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7~18页。

② [美] 霍米·巴巴：《献身理论》，见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景观》，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6页。

③ [英] 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④ 朱世达：《中国知识精英的美国情结》，见陶文钊、陈永祥主编：《中美文化交流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书所说的“跨文化”，即指在“中国文化”和“以北美和西欧为主的西方文化”之间的跨越。这既是中国人对“西方”的常规认识，也符合近些年来中国人“越界”行为空间位移上的客观状况。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偏向封闭的国家。安土重迁的乡土本性是中国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费孝通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生于斯，死于斯’的结果必是时代的黏着。这种极端的乡土社会固然不常实现，但我们的确有历世不移的企图，不然为什么死在外边的人，一定要包棺材运回故乡，葬在祖茔上呢？一生取给于这块泥土，死了，骨肉还得回入这块泥土”^①。但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国这一巨大的、自在的、封闭的区域，也被卷入全球化“越界”的洪流。其发生原因，既有“外迫性的强力”的推动，也是民族现代化的自觉选择。

以中国为起点的“越界”的空间移位者创作的文学作品，曾被冠以“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留学生文学”、“旅外文学”、“洋打工文学”、“域外文学”、“留洋文学”等名称。这些名称重点不同，或强调写作语言，或强调创作者身份，或强调地域特征，但都凸显中西地域之隔，它们把中西切割成截然对立的两个空间。在这些名称的阐释中，写作者的身份是单一的：是身在异乡的中国客。他们的写作是“写在家国之外”的行为。这样的单一和局限忽略了在全球化语境中更具流动性的现实存在：作家游走于中西之间，国籍、地域不再起限制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本书所论述的写作者的法律身份不能一概而论，包括移民、旅行者、留学者、访学者、归国者等，她们或“持出生国外某国护照”，或“持旅游签证”、“持留学签证”、“持工作签证”，法律身份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她们长期在国家间游走，在居住国和出生国之间处于流动状态。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等社会背景，特别是不同国家的文化，对她们的文化观、价值观、

^① 费孝通：《再论文字下乡》，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8页。

人生观、身份观、家国观等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她们的创作视野、视角等产生了显在影响。她们的创作，是在跨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有明显的全球意识和文化对比意识。这些作家对不同文化接触下人的现实生存和精神发展有深刻体会，她们的写作资源主要来自于此，也使她们的创作明显有别于单一文化背景下的作者，因此她们的写作可被称为“跨文化写作”。

跨文化写作与单一文化背景下的写作相比较，有其特定的生成语境。作家们跨越国界的起因和动机可能与时代的大背景相关，也可能与作家的个人主体选择有关，也可能二者兼有。跨文化意味着时间、空间、语言等方面的巨大改变，这样的处境使她们获得了同时看见里外两面的双重视野，使文学创作受益良多。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所关注的对象，以母国中的人生经历和人生感触为重，作家对自己出生国的记忆始终记忆犹新。同时，居住国的生存经验又成为新的、异质的精神资源。这些“现在”的经历和感触，又牵扯到写作者个人及民族、国家的记忆与历史。因此，跨文化写作不是局限于一地一时的写作，而是在两地甚至多地的相互纠缠和交迭中对现实和历史的多重挖掘和反省，有其独特的广度和深度，表达出曾经单一的某种经验或想象如何在地域、族裔、社会间移动或转化。跨文化写作还表现了民族、国家之间的对照想象关系，作家们在写作中确认他者，寻找自我，构建全球化背景下的主体性。就跨文化写作的审美性而言，作品往往既有脱离旧文化的自由感，又有离散导致的宿命般的失落感和无法确认自我的焦虑感，表现出认同和抵抗之间的张力。跨文化写作是在时空压缩语境下的文学写作经验，是立足于不同地域间的“虚拟”和“想象”。跨文化写作以文学的形式拷问双重背景下人类生存的处境和文化的冲突，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寓言。

在中国和居住地——西方间游走的写作者的创作，是20、21世纪世界跨文化写作的组成部分。但中国大陆背景写作者的创作，又具有其独特性。“20世纪的全球迁徙是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同样是迁移，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国度的不同移民有着截然不同的

经验，而反映这些历史经验的各国移民文学也大有差异”。^①人种、国别、民族、政治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差异，使不同情境下的跨文化写作呈现出不同面貌。出生国为中国的跨文化写作者，担负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在中国所生存时代的深刻烙印。即便他们不再希望纠结有关“过去”的话题，但“中国”这一符号是他们永远无法抛弃的印记，“无论你到哪儿去/中国都跟着你/仿佛一个影子/它古老的身姿”^②。中国具有稳定性的传统文化，近百年来，又经历着巨大的社会文化变迁。当代中国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的碰撞，有别于其他文化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以中国文明为文化母体的个人在与高度现代化的西方接触时，生发出的种种感慨必然是有中国特点的。在全球化进程的权力之争中，西方掌握着强势话语，出生地为中国的“越界者”属于弱势族群，他们如何在强势文化中生存、辨明并重建自己的身份、发出弱势族群的声音，也是中国背景跨文化写作的特点和主题。

就华人圈的跨文化写作而言，大陆背景、台湾背景、港澳背景的跨文化写作者共同创造了成就斐然的文学景观。其中有一些作家，本身的身份背景就有两岸三地的交叠。如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等，漂流辗转两岸之间，中西之间的经历丰富了他们的人生，扩大了他们的文学视域。他们的跨文化写作吸收了多元文化的营养，取得了被广泛认同的成就和地位。他们的人生轨迹从中国大陆经台湾到西方，文学创作蕴涵了极其丰富的文学及文化含义。从他们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中国大陆、台湾、西方多重文化的折射和反思。但本书把所论述对象的范围限定在直接从中国大陆到西方的写作者，是因为经大陆到台湾或港澳而到西方的跨文化写作者，与从中国大陆直接到西方的跨文化写作者，文化政治背景和文学背景都有了很大的差别，很难把他们概括为一个整体进行论述。虽然他们有相同的中国血缘和中华文明的背景，在文化身份上有相

^① 王腊宝：《流亡、思乡与当代移民文学》，《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第108页。

^② 欧阳昱：《墨尔本之夏》，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同的血缘和基因，但中国近半个世纪流离变迁的历史，使台、港、澳、大陆各有自己的发展轨迹。作家们写作的“亚背景”不同，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自有相异，对民族、国家、身份、性别等问题均有不同的书写，创作有各自独特的视野、方式、意义和价值。因此，本书所论的“中国女作家”，专指出生地为大陆、成长在大陆、直接从中国大陆到西方的女作家，本书希望揭示近三十年大陆背景对作家跨文化写作产生的独特影响和意义。

本书论述的时间段定为“近三十年”，是因为“近三十年”在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当代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近三十年的中国进入了非常关键的变革时期，在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形态等各方面发生了历史性巨变。自20世纪70年代末走出“文革”魅影，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结束了‘反现代性’的历史，重新开始了现代性的进程”，“改革开放是现代性的社会实践，开放就是向西方的现代性开放”，^①近三十年来，“全球化”不仅参与到中国民族、国家改革开放的经济命运中，而且还深刻影响到中国的文化模式。近三十年是中国文化激烈转型的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运行方式，而新旧文化冲突、中西文化冲突促成了文化模式的深层变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在哲学界和文学界进行的文化论争中，“西方”和“中国”的关系是核心话题之一。论及近三十年中国文学，中西的接触和碰撞也是绕不开的。从文化观念、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模式、写作者对生存及命运的感悟等方面，西方都对新时期及其后的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学是生存及心灵的反应，从20世纪80年代开放起，伴随中国“越界”现象的产生和日益普遍化，跨文化写作也形成了近三十年来越来越明晰及强有力的发展脉络。

“跨文化写作”不是一个阶段性的文学现象，而是历时性地持续发展，是流动的、开放的，它记录了近三十年来中国从单一的社会文化、生存语境走向全球化时代的历程。文学是特殊的文化形

^① 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3页。

态，文学创作既是对社会文化的表现，又是文化演进的一种表征。以小说创作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为例，爱德华·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分析了英国小说与资产阶级“文化帝国主义”的“相互扶持”关系：

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作品的小说和帝国主义如果缺少一方就是不可想象的。在一切主要的文学形式中，小说是最晚出现的。其出现的时间是最有记载的，其出现是最西方式的，其社会权威的规范模式的结构是最清晰的。我要说，帝国主义与小说相互扶持。阅读其一时不能不以某种方式涉及另一个。

不仅如此，小说有一种包容性很强、准百科全书性的形式。包含在它里面的既有高度有序的情节，也有建立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结构和它的权威和权力之上的一整套社会参照体系……^①

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和时代、社会、文化的关系亦如此。

通过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我们可以看到，近三十年来中国与外民族、外文化的接触、碰撞、冲突，是中国走向现代化非常必要的过程。文化接触的激烈撞击，使一些在单一文化背景下浮现出来的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如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主体性问题、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记忆问题、转型期的文化选择和个人选择问题、资本社会中人的自由和发展问题、性别问题、文学传承和发展问题，等等。跨文化写作直接表现跨越边界后中国人的文化立场、文化策略、身份焦虑、身份书写等问题。

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文化、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跨文化写作中都有相关的表现。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与出生国社会的联系和牵扯是无法割裂的。本书所选用的跨文

^①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96 页。